



上海市学术著作出版基金

凤凰涅槃

德国西占区民主化改造研究

张 沛 著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市学术著作出版基金

凤凰涅槃

德国西占区民主化改造研究

张 沛 著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凤凰涅槃:德国西占区民主化改造研究/张沛著.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7

ISBN 978-7-208-07515-3

I. 凤... II. 张... III. 政治制度-历史-研究-德国-现代 IV. D751.6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68143 号

责任编辑 张笑天

封面装帧 王晓阳

凤凰涅槃

——德国西占区民主化改造研究

张 沛 著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635×965 1/16 印张 20.25 插页 4 字数 234,000

2007 年 12 月第 1 版 200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208-07515-3/D·1293

定价 32.00 元

内容提要

二战后,西方盟国对德国西占区实行了一场强制性的民主化改造,内容包括“非纳粹化”、“经济民主化”、“政治民主化”和思想上的民主“再教育”等各个方面,涉及范围广,持续时间长,造成了深远的影响,为德国民主社会的健康发展提供了政治保障。更为重要的是,它促使了德意志人民对本民族的传统进行了深刻的内省和反思,消除了积淀在社会深层的消极因素,同时发扬光大了历史文化中潜藏的民主自由观念,同外部强制性的民主化改造实现了良性互动,最终促成了德国社会的根本转变。

德国西占区的民主化改造,是德国史和世界史、同时也是国际关系学和政治学中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深入细致地考察和研究这一问题,无疑会对研究德国与世界和平的稳定发展有着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作者简介

张沛, 博士,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战略研究室副主任。曾先后就读于河南大学和华东师范大学。长期从事高校历史教学和科研工作, 曾在北京大学历史系进修一年。2003年博士毕业后进入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工作。现主要从事中国外交战略、大国兴衰、中欧战略关系等研究。曾主持和参与多项省部级课题研究, 发表相关文章数篇。

凤凰涅槃

德国西占区民主化改造研究

序 一

德国独特的历史发展道路和曲折的民主政治发展进程，一直以来都是国内外社会科学界关注的热门话题。人们有理由怀疑，纳粹主义在德国的产生并非偶然，而是源于德国区别于欧美资本主义发展的“特殊道路”，是德国政治文化天然缺陷所造成的。

令人感叹的是，正是这样一个曾经令世界畏惧和不安的民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却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在战争废墟上建立起来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不仅迅速地从战争的劫难中得以恢复并再度崛起，建立起了真正现代意义上的民主国家，而且彻底地清算了历史，成为国际体系中维护和平、稳定与发展的大国。

值得深思的是，究竟是什么原因促使德国终结了其“特殊道路”。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本《凤凰涅槃——德国西占区民主化改造研究》，为我们提供了令人信服的部分答案。

这本专著是张沛博士在博士论文基础上修订而成。作者以二战后德国西占区的民主化改造为视角，对德国民主化改造进程中所涉及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心理诸方面作出了全方位和全过程的考察。据我所知，对于这一国外社会科学研究的热点课题，国内则长期未有充分关注，虽然在少数通史性作品或相关著作中有所提及，但系

统研究而有见地者鲜见。该书作者尽可能吸收了西方对这一问题的最新研究成果,体现出了其学术前沿性。在研究方法上,作者运用了政治学、国际关系学等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并将其融入到历史分析之中,读来有新鲜之感。这本专著的出版,无疑会对研究德国和世界的历史、现实和未来有所启示。

作者以较丰富的资料为基础,分别从非纳粹化、经济民主化、政治民主化、“再教育”等方面阐述美、英、法三国对二战后德国西占区进行“重建”与“改造”的政策与过程。特别是该书的“浴火重生”一章,着重探讨了德意志民族是如何深刻反思并积极回应外部强制性民主化改造的,指出这才是德国社会改造成功的内在依据。也就是说,战后德国民主化改造之所以得以成功,是以强制性的外部民主化改造为根基,以弘扬德意志民族潜藏的民主自由观念为根本动力,形成了“外源性”与“内源性”的良性结合,最终消除了德国社会深层的历史积垢,实现了人类社会文明发展史上社会改造的创举。虽然德国的历史具有其独特性,然而它对于今天各国处理全球化的挑战与内部建设改革的矛盾,仍有借鉴的意义。

60多年前,如果有人预测战后德国将会成为世界上稳定和平的民主国家,一定会被斥为“痴人说梦”。然而,半个多世纪来的历史发展却表明,战后德国已经坚定地走上和平发展的道路。在战争废墟上建立起来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不仅再次跻身于世界经济强国之列,而且最终实现了和平统一和新的崛起。再度崛起的德国在外交政策上注重寻求合作伙伴,以西方化和一体化为外交政策取向,以建立“非军事强国”为目标,以多边主义为解决国际争端的舞台,以营造良好的周边环境为关键,大大提高和改善了德国的国际形象。德国的和平发展,与其战后民主化改造的基础一脉相承,同时又有发展创

新,其间的逻辑联系值得深入探讨。相信本书的出版也会有助于对德国和平发展道路的经验总结。

俞新天

2007年2月7日

序 二

德国和日本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败国，在战争责任和战争罪行的反省问题上，态度有很大的差别。德国的认罪态度明显比日本好，它不仅多次公开承认自己发动了侵略战争、给他国造成巨大的灾难，而且主动向受害者提出赔偿。作为日本的邻国，我们不仅羡慕德国周边国家拥有一个好邻居，而且经常在追寻答案：为何德国的认罪态度较好？

有人认为，德国的认罪态度较好，根源于德意志的民族特性，德国人思想深刻，善于反思，对战争罪责问题也采取了理性的态度。究竟有无德意志特性，这个问题至今在德国国内外还存在争议，甚至波及德国的现代化发展进程是否需要独特的“德意志道路”这个更为深刻的问题。不少德国人竭力否认所谓的德意志特性，认为德国人与其他人一样，没有任何特殊之处。但是，如果在 60 年前提出这个问题，答案会迥然不同。当时，世界上绝大多数人非但认为德国人与众不同，而且认为他们是一群无可救药的人，他们守纪律，讲秩序，崇尚权威，一有机会就侵略别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的苏、美、英三巨头会议上，三国首脑一致确认了德国人的侵略性。斯大林在德黑兰会议上甚至表示，德国自第二帝国统一之后，经过 42 年的时间发

动了第一次世界大战,21年之后又发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看来,德国人为恢复国力所需要花费的时间正在缩短”;斯大林同时表示,“不管我们给德国施加什么禁令,德国人都能够有办法绕开它。我们禁止它生产飞机,但不能让它关闭家具工厂,可是大家都知道,家具厂可以很快改为生产飞机。我们禁止德国生产炮弹和鱼雷,但我们不能让它关闭钟表厂,而每个钟表厂都可以很快地转而生产炮弹和鱼雷的最重要部件”。^[1]对此,美国“摩根索计划”的解决办法是:肢解德国,除了把大片德国土地割给波兰和法国外,将工业发达的莱茵-鲁尔地区置于国际机构的控制下,剩余的领土再分割成南、北两个独立的自治国,除此之外,还要彻底摧毁它的工业生产能力,把它变成基本上是农牧业的国家。因此,简单地从德意志民族特性的角度去思考问题,是难以给出正确答案的。

少数国外学者试图从文化的角度深层次地探索这个问题,在大战结束不久就提出了东西方之间存在着“罪感文化”(guilt culture)和“耻感文化”(shame culture)差别的说法。所谓“罪感文化”,是以基督教文明为基础,主要内容是“提倡建立道德的绝对标准并且依靠它发展人的良心”。具体而言,基督教强调人生而有罪,一生都需要不断忏悔,由此形成“罪感文化”。而包括日本在内的东方民族注重脸面,最忌丢脸,“以耻为主要的‘社会性’强制力”,有错误的人即使当面认错、甚至向神父忏悔,也不会感到解脱,“不仅如此,忏悔和坦白反而是一种自寻烦恼的行为”,“因此,在‘耻感文化’中,并没有忏悔坦白的习惯,对于神明也是如此”。^[2]个别学者甚至将这两种文化同儿童的心理发展过程结合起来,认为人的羞耻感早于人的是非判断能力,因此,“罪感文化”高于“耻感文化”。^[3]粗一看,这种说法似乎很深刻,也颇有道理,其实经不起深究。基督教文明并不仅仅同“忏悔”挂钩,复仇者也可以从《圣经》中找到“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

语录。^[4]从历史上看,基督徒的“十字军东征”带给异教徒的,同样是血与火,而不是下跪与忏悔。更主要的证据是,德意志从民族形成之时起,早已普遍信奉基督教,但它的“罪感”,却不是一直都有的。相反,它的自负和傲慢,却给其他国家留下更深刻的印象。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当德国人接到《凡尔赛条约》的文本时,全国上下群情激愤,就连共和国的首任总理、社会民主党人谢德曼,都发出了“谁要是签署了这样的条约,他的手就会烂掉!”的诅咒。正是全民族的这种不服罪态度,推动德国又一次发动了世界大战。

那么,到底是什么因素推动德国转向较为正确的态度呢?

张沛博士的这本专著从某一侧面给我们作出了详细的解读,除此之外,还有两个因素值得我们关注。

其一,德法关系得到了正确的处理。

德法矛盾可称为源远流长,尤其是近代以来,两国之间就结下了“百年世仇”,曾多次兵戎相见,埋下了仇恨的种子。1870年,两国爆发普法战争,结果法国战败,普鲁士不仅据此统一了德国,还割取了法国的阿尔萨斯-洛林,获得50亿法郎的赔款。1914—1918年,两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继续厮杀,结果德国战败,不仅被割取领土,交出全部殖民地,还支付了数百亿马克的赔款。1940年德国再次入侵法国,六周内全部控制了法国。1944年法国抵抗力量借助盟军登陆诺曼底,很快光复全国,并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出兵占领了部分德国领土。战后的德法关系何去何从,是继续饮恨复仇,永无休止,还是借此告别过去,走出一条新路来,这不仅涉及长期困扰世人的“德国问题”能否得到彻底解决,也直接影响到欧洲乃至世界的和平局面。值得庆幸的是,德法两国交出了一份令人满意的答卷。

联邦德国首任总理阿登纳采取务实而积极的欧洲政策,努力推动西欧向一体化的方向发展,通过欧洲共同的振兴实现德国的重新

统一与复兴。他曾经公开表示：“在当今的欧洲，世仇完全不合时宜，我决心使德法关系成为我的政策核心。一位联邦德国总理必须同时是一个好的德国人和好的欧洲人”，“只有欧洲各国的合作才能拯救欧洲”。他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上任后主动向法国提议，建立两国间的关税同盟和共同议会，最终实现完全的联合。

对作为战胜国的法国来说，要“饶恕”已被打败的德国更为困难。事实上，战后初年，法国继续推行传统的对德“惩罚与压制”政策，力图肢解德国，把莱茵河西岸割离出去，同时阻止德国出现一个中央集权制政府。然而随着国际形势的演变，法国逐渐改变了对策，希望因势利导，同德国联合，利用德国的潜力促进欧洲复兴，同时在联合发展的过程中实现对德国的有效控制。在这方面，外长舒曼起了较大的作用，他所发表的《舒曼计划》打开了法德联合的大门。

从1951年到1967年，以德法两国为核心的欧洲六国联合，以成立“欧洲共同体”为宗旨构建出一个基本架构。此后，欧共体的一体化程度不断提高，从最初的关税同盟，发展到经济和货币联盟，又上升到政治联盟。在联合发展的过程中，德法之间延续了数百年的仇恨消减了，德国对战争罪责问题的态度也越来越明朗。公开认罪与联合发展两者互相促进，形成了一种良性循环。

其二，人们不应忽视德国社会民主党在认罪问题上的贡献。

纳粹党上台以后，德国社会民主党遭到希特勒的迫害，大部分领导成员流亡国外继续斗争。纳粹政权覆灭后，该党恢复活动，在首届联邦议院的选举中得票少于基督教民主联盟，成为在野党。该党主张“自由、公正和互助”，对外顺应世界潮流，改善同苏联、东欧国家的关系，拉开同美国的距离，为德国问题的解决创造新的环境。1966年，德国政局发生动荡，最后政府大改组，社会民主党领袖勃兰特入阁，担任副总理兼外交部长，组成大联合政府。自此，德国政府的认

罪态度日益明朗。1969年,社会民主党在大选中获得大胜,勃兰特担任总理。翌年,他在华沙犹太人殉难者纪念碑前献花,做出了一个轰动全球舆论的“赎罪”行动——向纪念碑下跪。这一举动,既开创了德国认罪行动的新阶段,又加快了德国融入欧洲的进程。人们也许已经注意到,几年前在布痕瓦尔德集中营解放60周年纪念活动中鞠躬致歉的德国总理施罗德,也是社会民主党人。

1990年德国重新统一后,德国担任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在海外用兵的问题逐渐提上议事日程,包括基督教民主联盟领袖科尔总理在内的不少政要都鼓吹趁机修改《基本法》,为日后出兵海外创造条件,但社会民主党则强调,修宪后的德国只可以派军队参加联合国的维和行动,不得在北约和其他名义下动用自己的武装力量。由于该党的反对,德国的修宪行动被推迟,其和平政策得到巩固。而在日本政坛,基本上是自民党“一党独大”,社会党委员长村山富市短期执政期间,也对战争罪责问题采取了较好的态度,但从长时段来看,该党对政府政策的影响比较小。

然而,对德国认罪态度影响最大的因素,则是本书提供的答案:战后初期的“德国西占区民主化改造”进程。研究这个课题具有一定的难度。战后初期,东西方对峙的“冷战”格局正在逐步形成,德国以及它的首都柏林被苏、美、英、法四国分区占领,东西方之间的分歧严重影响着德国的民主化改造。即使在西占区内部,美、英、法三国,由于国情、战争中的遭遇、战后的国际地位各不相同,对德国民主化改造的理念和措施也有很大的差别。同时,德国西占区的民主化改造涉及各个方面,既有“非纳粹化”——在这方面三个占领区的做法差异很大,又有“经济民主化”和“政治民主化”,还要加上对德意志民族的“再教育”。三个占领当局的不同理念和措施、民主化改造中各个领域所涉及的各个子系统、在时间的推移中各种措施的演变,所有这

些“元素”都各自独立存在,又在联系的过程中构成一个网络,它们既有自身演进的内在规律,又在同一个网络结构中互相纠缠和影响。要清楚地展现这一过程,自有其一定的难度。张沛博士使用必要的外文资料,基本厘清了这一进程的轮廓,在不少地方作了深入探索,条分缕析地向读者作了透彻的分析和展示,浓墨重彩地描绘出民主化改造的历史全景。尤其值得重视的是,作者在著作的最后部分,探索了战后德意志民族对历史的反思和对民主化改造的回应,从而展示了民主化改造进程中内外因素互动的立体式画面。德国的知识分子在发挥民族的主观能动性方面起到了领头羊的作用,他们勇敢地代表民族承担战争罪责,在文化重建过程中对国民进行民主思想的再教育,在 20 世纪 50 年代后期全国上下出现对战争罪责的“集体健忘症”时,又积极开展“战争记忆”活动,通过研究和探索相关的历史问题、在原集中营旧址上建造纪念馆、举办研讨会和报告会、出版书籍和杂志等一系列活动,以广泛揭露纳粹暴政,吸取历史教训。在这方面,基督教的反思和忏悔精神也许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尤其是在 20 世纪 60 年代中后期,当纳粹大屠杀的真相逐渐披露后,德国全国上下群情激愤,更加痛恨纳粹暴行,在这一过程中所透露出的基督教因素,似乎更加明显。

衷心祝贺这本既有很高学术价值、又有很强现实意义的专著正式出版。

郑寅达

2007 年 1 月 20 日

注 释

- [1] 拙著：《会议桌上的世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大国安排战后世界纪实》，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40、72 页。
- [2] 中村雄二郎：《日本文化中的恶与罪》，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102 页。
- [3] 2003 年 10 月 9 日美国学者彼得·伯顿在上海社会科学院的演讲。
- [4] 参见《旧约全书·出埃及记》。

.....

马克思主义研究 哲学社会科学研究 第十九辑 (2007年12月)

.....

- 《文明与早期国家探源——中外理论、方法与研究之比较》 陈淳 著
- 《中国小说学主流》 罗书华 著
- 《话语与生存——解读战争年代文学》 文贵良 著
- 《纪录电影大师伊文思研究》 聂欣如 著
- 《WTO争端解决机制研究》 朱榄叶 著
- 《生态文化的审美之维》 王茜 著
- 《意义诠释与未来时间纬度》 王峰 著
- 《抗战前期上海外汇市场研究》 宋佩玉 著
- 《中国FDI绩效研究》 沈桂龙 著
- 《近代中国公司治理——思想演变与制度变迁》 杨勇 著
- 《凤凰涅槃——德国西占区民主化改造研究》 张沛 著
- 《当代印度外交》 马缨 著
- 《城市郊区集体土地价格形成机制与利益分配研究》 王克强 刘红梅 著
- 《教育研究重心的转移》 杜晓利 著
- 《穆藕初评传》 高俊 著

.....

博士文库 第九辑 (2007年12月)

.....

- 《“科学时代的人文主义”——〈思想与时代〉月刊(1941—1948)研究》 何方昱 著
- 《晚清主要小说期刊译作研究(1901—1911)》 杜慧敏 著
- 《晚清电报及其传播观念(1860—1911)》 孙黎 著
- 《人民币汇率变动的价格传递及其对中国贸易收支影响的理论和实证研究》 赵大平 著
- 《情绪、学习与资产回报——基于学习行为的噪声交易者情绪演化研究》 孙碧波 著
- 《基本养老保险替代率水平研究》 于宁 著